

## 兩蔣威權體制特性再探——從柏楊案談起

李福鐘

### 摘要

蔣介石與蔣經國（簡稱「兩蔣」）對臺灣近四十年的統治，學界素以「威權主義」視之，然而兩蔣威權統治的性質與特徵為何？多年來仍欠缺嚴謹的分析和檢討。本文嘗試透過1968年因為翻譯「大力水手」（Popeye）漫畫遭到逮捕判刑的柏楊案例，一方面呈現當時臺灣情治系統實際負責人蔣經國係以何種方式介入案件之偵查及審判過程，為1960年代蔣經國統轄臺灣情治機關，提供更豐富的細節和理解；另方面，透過檢視蔣經國父子統御龐大情治系統的模式，以及蔣家第三代在權力接班問題混沌不明的1980年代初期，如何受到政府官員特殊待遇的情事，看出兩蔣威權統治近似於「世襲化」的強烈特徵。本文認為，在兩蔣近四十年的統治下，尤其是對情治系統的絕對掌控，造成一部分中華民國政府官員表現出僅對個人和家族效忠的現象，取代了依據憲法精神必須忠於國家和人民，並維持行政中立的原則。過去對於兩蔣威權統治的研究多聚焦於黨國體制與白色恐怖，本文認為，國家權力家族化的問題，同樣是兩蔣政權不容忽視的特徵。

關鍵詞：蔣經國、蔣介石、柏楊、大力水手、威權統治、世襲

# Reapprai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s of Chiang Kai-shek and Chiang Ching-kuo: The Sedition Case of Bo Yang

Fu-chung Li<sup>\*</sup>

## Abstract

Most researchers deem the 40-year rule of Chiang Kai-shek and Chiang Ching-kuo as authoritarianism. Few detailed analyses or assessments exist, however,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eatures of the Chiang family's authoritarian regime.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amine the case of Bo Yang (aka Kuo Yi-tung), the famous writer arrested and jailed in 1968 for his translation of a Popeye comic, in illustrating how Chiang Ching-kuo controlled Taiwan's security agencies in the 1960s. While re-examining this case, it is also revealed that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governmental officials gave very preferential treatments to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the Chiang family in the early 1980s, when the issue of leadership succession on the island remained sensitive and unclear. The study thus highlights the patrimonial nature of the Chiang regime. Under nearly four decades of Chiang's rule, especially the absolute control of security agencies by the family, many governmental officials ignored the principle of civil service neutrality and gave their allegiance to certain individuals instead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the monopoly of state power by a single family wa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authoritarian rule of Chiang Kai-shek and Chiang Ching-kuo that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Keywords:** Chiang Ching-kuo, Chiang Kai-shek, Bo Yang, Popeye, Authoritarian Rule, Patrimonial

---

<sup>\*</sup>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兩蔣威權體制特性再探——從柏楊案談起\*

李福鐘\*\*

## 壹、前言：再論兩蔣威權體制

1970年由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和Clement H. Moore合編的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當代社會之威權政治：建制化一黨體制之動力學》）一書，收錄了當時任教於美國底特律大學戴鴻超教授的〈國民黨與臺灣的現代化〉一文，<sup>1</sup>這是全球學術界第一次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歸類於「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及「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的政治學分類項下。<sup>2</sup>

---

\* 本文審查過程中，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相當寶貴修改意見，謹此致謝。惟文中疏漏及未臻完善之處，自仍由筆者負完全責任。

收稿日期：2021年5月10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年8月4日。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sup>1</sup> Tai Hungchao（戴鴻超），“The Kuomintang and Modernization in Taiwan,” in Samuel Huntington and Clement H. Moore,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p. 406-436.

<sup>2</sup> 事實上戴鴻超在論文中並未實質分析蔣氏政權的威權主義特質，亦未使用「威權」、「威權主義」等關鍵字形容蔣介石政府，頂多只提到諸如「一黨體制」（one-party system）或「獨大」（preponderant）等詞彙。該文甚至刻意凸顯在蔣介石的一黨體制下，造就了當時臺灣的經濟成長。倒是主編Samuel Huntington在該書第一章，持續拿1950-1960年代的國民黨政權與土耳其在1950年以前一黨獨大的共和人民黨（RPP）相比較，並將兩者歸類在同一分類項。簡言之，這是蔣氏政權第一次在政治學上被視為「威權主義」，只不過尚未被仔細檢視。參見Samuel Huntington and Clement H. Moore,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 pp. 16-22.

所謂威權主義，係由美籍西班牙裔學者胡安林茲（Juan J. Linz）於1964年所提出的政治學理論。胡安林茲之所以開創威權主義的理論，主要發想是用以分析二十世紀存在於民主政體和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之間為數眾多的「非民主政體」的特質，這些政體的統治形態既非民主政治，亦迥異於納粹德國和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蘇聯。這類被胡安林茲歸類為「威權主義」的政權，「並非僅僅只是民主與極權主義之間的漸變體（continuum），而是一種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政權類型」。<sup>3</sup> 胡安林茲這一政治學理論，不僅可以用來分析1936-1975年間統治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Franco Regime），還可以套用在同時期的葡萄牙獨裁者安東尼奧·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sup>4</sup> 或者奧地利遭納粹德國併吞前的「神職法西斯」（clerical-fascists）政權身上。<sup>5</sup> 也因此，在1970年杭廷頓所編的書中，將1949年之後統治臺灣的蔣介石政權納入所謂威權主義體系，並不令人訝異。儘管蔣介石在1949年敗退臺灣之後，經常在公開場合宣稱要在臺灣「建立民主制度」，<sup>6</sup> 並自我標榜為「自由中國」，<sup>7</sup> 但事實

<sup>3</sup>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Macropolitical Theory*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1975), pp. 178-179.

<sup>4</sup> 葡萄牙自1932年至1968年長期由安東尼奧·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擔任總理。

<sup>5</sup> 所謂奧地利的「神職法西斯」政府，係指二次大戰前夕由祖國陣線（Vaterländische Front）短期執政的奧地利聯邦國（Federal State of Austria, 1934-1938）。1938年3月，奧地利納粹黨發動政變，推翻奧國政府，隨後奧地利遭納粹德國併吞。胡安林茲在其著作中，曾舉佛朗哥、薩拉查與奧地利神職法西斯政府為例，解釋威權體制係基於何種因素方未進一步轉變成極權政體。參見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 *Macropolitical Theory*, p. 197.

<sup>6</sup> 蔣介石，〈本黨應建立自立自強羣策羣力的新精神〉（1951年1月8日），收入中央改造委員會編，《總裁關於黨的改造之訓示》（臺北：中央改造委員會文物供應社，1951年），頁170-171。另外，1950年在國民黨改造委員會成立之後不久，蔣介石於8月14日在聯合擴大紀念週上亦提出類似的說法：「今後建設臺灣的工作，只要我們繼續不懈的努力，……發揚民主法治的精神，……我相信臺灣必能建設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參見蔣介石，〈本黨今後努力的方針〉（1950年8月14日），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編，《總裁關於黨的改造之訓示》，頁115。

<sup>7</sup> 蔣介石在1950年代初期，諸多論文或演講中經常以「自由中國」稱呼自己所領導的政府，例如1952年10月提交給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反共抗俄基本論〉，在第三章第三節的子標題「丙」和「癸」中，皆使用了「自由中國」的稱號。參見秦孝儀主編，《蔣總統集》，第1冊（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74年第4版），頁240、245。另外1951年8月26日在國民黨夏令講習會結業典禮上，稱呼臺灣為「自由中國的復興基地」；1952年10月

上，西方學術界並不因此就相信臺灣的蔣氏政權是一民主政體。

到1980年代以降，開始出現實質以威權主義理論分析國民黨政權的著作，<sup>8</sup>而臺灣則在1988年蔣經國去世之後，湧現大批以威權主義套用解釋兩蔣政權的作品。<sup>9</sup>然而五十年來所有相關著作，並未充分說明何以蔣介石的政權符合胡安林茲有關威權主義的四項定義，這四項定義分別是：

- (1) 舉凡政治體系具有有限且非責任制的政治多元性；
- (2) 欠缺細緻並指導性的意識形態（但卻有相當明顯的心理狀態）；
- (3) 欠缺高強度和鋪天蓋地的政治動員（除了在其發展階段的某些時刻外）；
- (4) 體系內由一位領袖（或有時是一個小集團）在形式上無明確界限但實際上則相當可以預料地施展其權力。<sup>10</sup>

何以蔣介石及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政權在性質上屬於威權主義？儘管半個

---

21日在僑務會議開幕典禮上，稱臺灣全體軍民為「八百萬自由中國的軍民」；1954年2月19日對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的講話，亦以「自由中國」自稱。以上分別見諸秦孝儀主編，《蔣總統集》，第2冊（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74年第4版），頁1795、1854、1889。

<sup>8</sup> 例如美國學者Edwin A. Winckler,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99 (Sep. 1984), pp. 481-499；或者日本學者若林正文，〈歧路に立つ政治体制——権威主義体制の原型、變容、移行〉，收入若林正文編著，《台灣——轉換期の政治と經濟》（東京：田畑書店，1987年），頁13-99；Nai-teh Wu（吳乃德），“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7). 臺裔旅美學者Tun-jen Cheng（鄭敦仁），“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1:4 (July 1989), pp. 471-499等等。

<sup>9</sup> 包括徐振國（1988）、王振寰（1989）、林佳龍（1989及1999）、朱雲漢（1989）、田弘茂（1989）、彭懷恩（1990）、陳明通（1995）、吳文程（1996）、龔宜君（1998）、丁仁方（1999）、薛化元、楊秀菁（2004）、蘇瑞鏘（2014）等政治學或歷史學者，都曾以威權主義之相關概念運用在關於兩蔣政權之研究上。本文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舉介紹。一個簡要但不完整之脈絡整理，可參見李福鐘，〈兩蔣威權主義之類型分析〉，收入張炎憲、許文堂主編，《台灣地位與中華民國體制》（臺北：台灣教授協會，2012年），頁239-265。

<sup>10</sup> Juan J. Linz,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pain,” in Erik Allardt and Stein Rokkan, ed., *Mass Politics: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0), p. 255. 胡安林茲原文並未有4個編號，本文為便利讀者更清楚閱讀該定義的內容，因此刻意以編號作出區隔。



世紀來學術界漸漸習慣以「威權主義」甚至是「黨國威權主義」(party-state authoritarianism)的概念來形容兩蔣政權。<sup>11</sup>但是兩蔣政權如何、以及在何種程度上表現出「有限且非責任制的政治多元性」？兩蔣政權為何「欠缺細緻並指導性的意識形態」？還有兩蔣政權是否曾經推動「高強度和鋪天蓋地的政治動員」？所有這些問題，理應是研究者打算以威權主義分析兩蔣政權時必須加以回答，但卻在過去五十年的學術論述中，長期遭到忽略。

本文限於主題及篇幅，無法全面且完整地面對這一學術挑戰。但不得不提出此一缺憾，係有感於一旦欠缺足夠之理論驗證，吾人將對兩蔣政權將難以獲得更深入的理解。譬如說，以戒嚴時期(1949-1987)惡名昭彰的情治機關和白色恐怖為例，值得注意的是胡安林茲並未在他有關威權主義的四項定義中列入「白色恐怖」或「秘密警察」，那麼，以鋪天蓋地的情治部門在臺灣施行近四十年白色恐怖的兩蔣政權，<sup>12</sup>何以確實屬於威權主義？當三十餘年來臺灣學術界競相以威權主義作為研究兩蔣政權的理論概念時，是否應該在理論的應用和歷史事實之間的扞格或矛盾處，進行必要的驗證和解釋？

事實上，「恐怖統治」與「秘密警察」反而是極權主義的顯著特徵，卻不一定在威權政體中出現。從漢娜·阿蘭特(Hannah Arendt)在1951年出版她的名著《極權主義的起源》，<sup>13</sup>到對極權主義理論體系作出完整論述的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和Carl J. Friedrich，<sup>14</sup>甚至於胡安林茲在1972年所作關於威權主義與極權主義的經典比較，<sup>15</sup>都可以看到在極權主義統治下有關恐怖

<sup>11</sup> 例如Shelley Rigger, *Politics in Taiwan: Voting for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1999)一書，即稱呼兩蔣時代的國民黨政權為「黨國威權體制」。至於為何在兩蔣政權的威權主義性質上冠以「黨國」二字，則係源於鄭敦仁發表於1989年之研究，此點留待下文詳述。

<sup>12</sup> 有關戒嚴時期令臺灣人民聞之色變的情治機關和白色恐怖，初步而宏觀的介紹可以參見劉照明，〈蔣中正與蔣經國在戒嚴時期「不當審判」中的角色〉，《臺灣史研究》，第6卷第2期(1999年12月)，頁139-187；陳翠蓮，〈台灣戒嚴時期的特務統治與白色恐怖氛圍〉，收入張炎憲、陳美蓉主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年)，頁44-69。

<sup>13</sup>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Cleveland, Ohio: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8), pp. 419-479.

<sup>14</sup>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130-173.

<sup>15</sup>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統治和秘密警察的討論。但是，這項特質卻未被胡安林茲納入關於威權主義的定義中。胡安林茲的決定不難理解，以威權主義的原始典型——佛朗哥政權為例，該政權在贏得內戰勝利之後，鎮壓政治異議人士主要仰賴的是訂立特別法和軍事審判，<sup>16</sup> 不像蔣介石除了也仰賴刑法之特別法（例如「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外，同時還要長期維持一套龐大的情治特務系統。蔣介石的這一做法，就全球威權政體來說，其實是頗為特殊的案例。

因此，難道基於這一扞格，吾人必須將兩蔣威權統治從威權主義改隸為極權主義？這當然說不通，兩蔣政權明顯不屬於極權主義，這個事實並不需要太繁複的說明——與納粹德國、毛澤東治下的中國、史達林時期的蘇聯，以及金氏家族所統治的北韓相比，1949至1988年的臺灣明顯不屬於極權統治。對此，漢娜·阿蘭特說得十分斬釘截鐵，她說：「至今為止，我們只知道兩種真正的極權統治形態：1938年之後的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獨裁統治，以及1930年之後的布爾什維克獨裁統治。」<sup>17</sup> 當然，漢娜·阿蘭特的這一論述出版於1951年，但即使再晚個十或二十年，相信她也不致於把蔣介石政權列入清單中。

那麼，既然兩蔣政權明顯不屬於極權政體，何以它又擁有通常為後者所有的特徵——秘密警察？如果吾人不準備變更兩蔣政權的威權主義屬性，何以兩蔣政權竟然帶有極權主義所慣有的特徵，便成為分析兩蔣政權不應該迴避的學術課題。

的確，仔細分梳兩蔣政權的政治學特徵，往往迷惑於其與原始版本威權主義之間的若干違和處。這或許也是若林正丈在1987年的研究中，刻意將兩蔣的威權

---

Polsby ed., *Macropolitical Theory*, pp. 217-228.

<sup>16</sup> 佛朗哥在取得內戰勝利後，隨即在1939年2月9日通過一項「政治責任法」（Law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用以追究前共和政府成員和異議人士的罪責。此外，即使1948年4月之後西班牙已解除全國性戒嚴，一般平民仍可以因政治案件而被送交軍事法庭。有關西班牙在1936-1975年佛朗哥執政期間對政治異議人士的鎮壓方式，參見Stanley G. Payne, *The Franco Regime 1936-1975* (London: Phoenix Press, 1987), pp. 221-228, 378, 501-503. 該書作者Stanley Payne相當直白地指出，佛朗哥政權對異議人士的整肅，與史達林和希特勒模式的恐怖統治是截然不同的。參見Stanley G. Payne, *The Franco Regime 1936-1975*, p. 223.

<sup>17</sup>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 419.

統治類型稱作「臺灣型威權主義體制」的原因。<sup>18</sup> 不過平心而論，以這樣的特例方式將臺灣歷史經驗獨立於全球其他國家之威權主義類型之外，並不是太理想的作法。不久鄭敦仁於1989年發表〈準列寧式政權在台灣之民主化〉一文，在這篇論文中，鄭敦仁指出國民黨本質上就是個列寧式政黨，包括它的黨國體制、以黨領政，尤其是擁有一套宰制性的三民主義意識形態，使其與列寧式政黨無分軒輊。<sup>19</sup> 至於胡安林茲斷言威權主義欠缺全面壟斷性的意識形態，鄭敦仁認為與國民黨政權的特質並不吻合。<sup>20</sup> 因此，他另行創造了一個新名詞「準列寧式威權主義」（Quasi-Leninist Authoritarianism）來稱呼國民黨政權。在鄭敦仁的論文發表之後，臺灣學界於是紛紛援引並以「黨國威權主義」的概念稱呼兩蔣政權。<sup>21</sup> 如此一來，理論面上似乎找到了一種具有一定說服力的說法，來解釋何以兩蔣政權在威權主義的本質之外，卻披著極權主義的外衣——由於國民黨特殊的歷史經驗，使其組織形態近似於列寧式革命政黨，甚至還具備了一個其他威權政體所沒有的三民主義意識形態。如此一來，蔣氏政權曾經建構出龐大的情治系統並施行白色恐怖，似乎也就言之成理了。

然而這樣的解釋方式，真的釐清了兩蔣政權的政治屬性，並且標示出該政權在全球威權主義光譜中的相對位置了嗎？實際情況是，後續研究者似乎皆不打算糾纏於兩蔣政權的歷史經驗是否吻合威權主義定義，亦不管三民主義是否真的是一種意識形態而非胡安林茲所稱的「心理狀態」，而僅是將「威權主義」當作一個標籤，用來標示兩蔣政權的非民主本質。<sup>22</sup> 這樣的作法，當然對於兩蔣政權的威權性格研究，沒有實質的幫助，吾人對於兩蔣政權的理解，也只能繼續停留在

<sup>18</sup> 若林正丈，〈岐路に立つ政治体制——權威主義体制の原型、變容、移行〉，頁26-40。若林正丈坦言兩蔣政權無法簡單歸類為威權主義，而須冠以「臺灣型」作為某一特殊之子類型。

<sup>19</sup> Tun-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1:4, pp. 471-499.

<sup>20</sup> 鄭敦仁認為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而非僅只胡安林茲所指稱的「心理狀態」。參見Tun-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1:4, pp. 476-477.

<sup>21</sup> 事實上，包括若林正丈，稍後也採用了鄭敦仁的看法，參見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新自然主義公司，1994年）。

<sup>22</sup> 這是筆者對於本文註9中所引既有研究文獻的綜合看法，限於篇幅，不一一敘明，容留待另文分析。



籠統而含糊的認知狀態。

本文立基在兩蔣政權建構了龐大的情治系統（秘密警察）這一歷史事實上，試圖進一步追究兩個問題：第一，兩蔣的情治部門究竟是如何「鑲嵌」在其威權主義的帽子上？第二，該情治體系在運作的過程中，究竟如何顯現出兩蔣政權將原本屬於國家的公權力「家族化」並「世襲化」？透過以下分析，尤其藉由發生在1968年的柏楊案，將可以進一步瞭解蔣經國在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角色。而且在案情過程中，同時還可以看到情治機關首長如何向蔣經國個人——而非其職務——表現出某種極端特殊的效忠方式。這已遠遠逾越憲政規範下的行政倫理，達到政治權力世襲化的程度。

## 貳、蔣經國與情治機構

自從1961年孫家麟在香港出版《蔣經國竊國內幕》一書之後，<sup>23</sup>基本上蔣介石在1949年7月召開「高雄會議」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蔣經國被指定為委員之一，到隔年3月在總統府內成立「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由蔣經國擔任主任，之後全國情治工作逐漸交由蔣經國總指揮的經過，大致上已有了粗略的輪廓。然而，多年來蔣經國究竟透過什麼樣的程序、形式指揮情治系統，卻始終沒有清晰具體的描述。1990年代中期郝柏村接受口述訪問時，曾透露1972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之前，「情治都是他自己在管」。<sup>24</sup>也就是說，從1950年3月蔣經國出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之後1954年9月晉陞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直接指揮國家安全局（以下簡稱「國安局」），<sup>25</sup>最後在1972年5月接任行政院長，將情

<sup>23</sup> 孫家麟，《蔣經國竊國內幕》（香港：自立出版社，1961年）。此書在蔣經國死後不久於臺灣翻印出版，然而翻印者將章節標題及內文文字做了部分修改，包括書名也改成《蔣經國建立臺灣特務系統秘辛》。臺灣翻印版本資料如下：孫家麟，《蔣經國建立臺灣特務系統秘辛》（臺北：全能出版社，1988年）。

<sup>24</sup> 郝柏村，《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年》（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頁251。

<sup>25</sup> 蕭李居，〈國防會議的設置與法源初探（1952-1967）〉，收入黃翔瑜編，《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8年），頁407-417。

治會談的工作交由國防部長主持，<sup>26</sup> 前後長達二十二年，全國最高情治首長一直是蔣經國。

細讀以上兩則文獻記載，不難看出一件十足違背民主憲政原則的問題，即不論蔣經國的職位、職等為何，全國最高情治機關的指揮工作始終由他負責。一個依法行政的政府，可以因人設事至如此程度，機關長期隨著特定人士移轉，委實令人咋舌。此一怪現象存在的原因無他，只因為蔣經國是黨政軍最高領袖蔣介石的長公子。從這一事實，已經可以看出蔣介石自1949年撤退來臺之後，處心積慮培養其長子掌握國家大權，這是蔣氏政權將國家權力「家族化」的開始。<sup>27</sup>

孫家麒在其著作中有一段形容，對「蔣太子」的特殊身分和特殊權力作了相當傳神的描述：

「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這個名銜，真是微不足道，然而大家不要以為它僅僅是機要室下面的一個小小單位，而便小看了它，實際上它是一顆包在敗絮裡面的鑽石，雖然沒有關防大印，祇有個木刻條戳，但是就憑這個木戳，有時再加上一顆太子先生的名章，便已所向披靡，沒有那個機關敢不另眼相看！<sup>28</sup>

然而，實務上蔣經國究竟如何以一個不甚起眼的「資料組」節制指揮各情治部門？尤其在1955年國安局正式成立後，以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職務控制整個情治體系？光憑孫家麒簡單的敘述，又或者各種組織隸屬關係表，<sup>29</sup> 還是不足以令讀者有更具體的理解。本文試圖透過國安局解密的「柏楊案」檔案，以更具體的細節呈現當1967年12月底《中華日報》開始連載一則有關大力水手「卜派」

<sup>26</sup> 郝柏村，《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年》，頁252。

<sup>27</sup> 蔣介石透過執政優勢培養自己長子接班的歷史過程，除了孫家麒留下歷史見證之外，曾自江西贛南、重慶及南京時期一路追隨蔣經國的蔡希曾（蔡省三）和曹雲霞，亦曾留下豐富的記述，參見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9年）。

<sup>28</sup> 孫家麒，《蔣經國建立臺灣特務系統秘辛》，頁25。

<sup>29</sup> 包括孫家麒在其書中，以及近二十餘年來有關白色恐怖的學術研究者劉照明和陳翠蓮，都曾在作品中繪製所謂的情治機關工作關係圖，參見孫家麒，《蔣經國建立臺灣特務系統秘辛》，頁27；劉照明，〈蔣中正與蔣經國在戒嚴時期「不當審判」中的角色〉，《臺灣史研究》，第6卷第2期，頁147；陳翠蓮，〈臺灣戒嚴時期的特務統治與白色恐怖氛圍〉，收入張炎憲、陳美蓉主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頁49、52。

（Popeye）買下一個小島的連環漫畫時，情治系統內部的檢舉密報機制如何啟動，以及案件進入偵察階段後，情治機關透過何種流程，層層向蔣經國彙報。相信經由這些描述，讀者可以對蔣經國如何以個人意志領導情治體系，以及兩蔣政權如何透過情治系統箝制言論、打擊異己，有更貼近的理解。

當然，本文最密切關心的問題，仍在於這起案件偵辦過程中，如何透露出當蔣介石把國家情治系統交給自己兒子全權掌理之後，同時也等於將國家公權力「私有化」（privatization）、「家族世襲化」（patrimonialization）。政府公務人員效忠的對象已不再是國家或憲法，而是向特定的政治領袖及其家族效忠。

### 叁、卜派選總統

發生在1968年的柏楊（郭衣洞）叛亂案，最終以國防部在1969年12月8日覆判維持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以下簡稱「警備總部」）一審判決十二年徒刑定讞。<sup>30</sup> 不論是國防部的判決書，或是警備總部之一審判決，皆指控柏楊於1948年11月瀋陽遭中共占領之後，「接受匪訓」，並遊說留滯北平的國立東北大學助教莊騰祖「保護人民財產等待共匪接收」，而在抵達臺灣之後，持續為文攻訐政府，發揮「為匪宣傳及統戰之效用」，因此認定罪證確鑿，駁回上訴。<sup>31</sup>

然而近半個世紀來，不論社會大眾或柏楊本人，皆心知肚明1967年12月14日至隔年（1968年）1月5日刊登在《中華日報》第10版（家庭版）的「大力水手」漫畫，才是他獲罪的真正原因。在該連載漫畫中，大力水手「卜派」買下了一塊原本稱作「北菠菜維亞」（North Spinachovia）的小島，卜派決定將小島更名為「卜派拉尼亞」（Popalania），或可譯作「卜派國」。躊躇滿志的卜派發出豪語：「可以擁有自己的國家真好，我可以是國王，是總統，我想是啥就是啥！」「我絕對是卜派國所有人民絕對的統治者！」此時卜派的兒子在一旁插嘴說：

<sup>30</sup> 「國防部判決書」（1969年12月8日），〈郭衣洞案〉，《國安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803000000A/0057/C280206/0001/03/010。

<sup>31</sup> 「警備總部判決書」（1969年10月30日），〈郭衣洞案〉，《國安局》，檔號：A803000000A/0057/C280206/0001/03/010。

「所有人民？那不就是我！」原來，卜派國的成員就只有兩個人——卜派和他的兒子Swee-pea。卜派接續聲稱，卜派國將是全世界最和平的國家，卜派的兒子於是問他準備怎麼治理這個國家？卜派決定舉行自由選舉，他並將親自參選總統。而為了競選總統，卜派決定發表競選演說，他的演講辭以「諸位卜派國人民」（Fellow Popalanians）作為開頭。<sup>32</sup> 然而這一句開場白，被柏楊刻意翻譯成：「全國同胞們……。」<sup>33</sup>

政治敏感度高的讀者，此時可能已經嗅聞到在柏楊翻譯的漫畫中，濃濃的政治諷刺氣味。因為當時的臺灣，全國上下只有一個人可以拿「全國同胞們」作為演講的開場白，那就是總統蔣介石。<sup>34</sup> 更何況，蔣介石在1949年來臺之後，以長子蔣經國主掌情治、軍中政工及青年學生動員系統，又是舉目皆知的事情。卜派和他的兒子來到一座小島，而且還要競選總統，很快便被聯想為蔣氏父子對臺灣的統治。

仔細比對美國漫畫家Bud Sagendorf所繪原版大力水手之英文對白，與柏楊在1967年至1968年間為《中華日報》所作的翻譯，可以看出柏楊在某些文意上確實並非翻譯，而是改寫，而且這種改寫，多多少少帶有譏諷和嘲弄。例如上述卜派所發豪語：「可以擁有自己的國家真好，我可以是國王，是總統，我想是啥就是啥！」事實上在原文漫畫中，卜派的說法精確翻譯出來應該是：「我絕對是卜派國所有人民絕對的統治者！」<sup>35</sup> 卜派既未提到總統，也沒說什麼國王。再譬如接下來，卜派向Swee-pea發願：「卜派國即將成為地球上最和平的國家！」

<sup>32</sup> 以上有關大力水手建立卜派國，並準備參選總統的情節，英語漫畫原本參見孫觀漢編著，《柏楊的冤獄》（高雄：敦理出版社，1988年），頁24-27之附圖。

<sup>33</sup> 〈大力水手〉，《中華日報》，臺北，1968年1月5日，版10。柏楊在他的回憶錄中，稱自己當時的譯文為「全國軍民同胞們」，而非「全國同胞們」。參見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年），頁252。

<sup>34</sup> 根據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調閱國安機關有關柏楊案檔案，確實有情治機關人員在《中華日報》1968年1月3日的大力水手漫畫剪報之下，以原子筆注記：「上圖所謂『寫一篇告全國同胞書』很明顯係影射 總統。因全世界只有我國 總統寫告全國同胞書。」參見陳鈺馥報導，〈媒體噤聲年代！促轉會揭「大力水手」情治檔案〉，收入「《自由時報》網站」：<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278789>（2021/7/31點閱）。

<sup>35</sup> 孫觀漢編著，《柏楊的冤獄》，頁25。

Swee-pea則詢問：「你準備怎麼實現它？」柏楊卻把這一段話翻譯成：「你（指Swee-pea）算皇太子吧！」Swee-pea則頂嘴：「我要幹就幹總統。」<sup>36</sup> 在柏楊的譯文中，一直刻意省略「卜派國」這個特定的空間名辭。少了這一子虛烏有的概念緩衝，卜派所買的小島（事實上柏楊亦未將「買」這一經過翻譯出來）就容易與讀者閱報時所身處的臺灣產生情境轉移。更甚者，除了卜派最後發表演說時明明說的是：「諸位卜派國人民……」，而柏楊擅自改成「全國同胞們……」之外，1968年1月3日當天的連載，卜派伏案疾書，原文版卜派本說的是：「我們將舉行自由選舉，而我要競選總統！」柏楊卻將之改成：「我要寫一篇告全國同胞書。」<sup>37</sup> 總而言之，柏楊不斷在其改編版本中憑空加入許多具有「聯想」潛力甚至「隱喻」（metaphor）的符號，例如「告全國同胞書」、「全國同胞們」、「國王」、「皇太子」之類的語句。類似這樣字辭，在1980年代以前的臺灣政治語境（political context）中，皆具有高度專屬的政治意涵。譬如說「太子」一詞，至少自1940年代重慶國民政府時期開始，便是蔣經國在國民黨政治圈內眾人心知肚明的代號。<sup>38</sup>

雖然柏楊在多年後的口述回憶錄中，堅持自己「心中並沒有絲毫惡意，只是信手拈來而已」，也因此譯畢之後，心中沒有一點不安，甚至上床安然就寢。<sup>39</sup> 但是「惡意」存在與否，不見得能夠純粹由單方面來判斷，尤其這一系列漫畫見諸報端之後，檢舉密報很快便層層送達最高情治機關，蔣經國對於「惡意」存在與否的判斷，才是最終之決定因素。儘管柏楊在1990年代所出版的口述回憶錄中聲稱當他著手翻譯時「沒有絲毫惡意」，然而難道沒有一絲揶揄嘲諷、嘻笑怒罵的用心？他自認無傷大雅的「幽默」，在情治人員眼中，便成了大逆不道的影射污蔑。而後者這一羣體，在1949-1992年臺灣白色恐怖的政治環境中，手操生殺大權，隨便可以指控「叛亂」入人於罪，令當時平民百姓聞風喪膽。柏楊所以

<sup>36</sup> 孫觀漢編著，《柏楊的冤獄》，頁25。孫觀漢將柏楊刊登在《中華日報》上的譯文以中英對照方式呈現在其所編書中，如果讀者有興趣檢索《中華日報》原始出處，上述兩則對話分別見於該報1968年1月1日及1月2日之第10版。

<sup>37</sup> 孫觀漢編著，《柏楊的冤獄》，頁27；〈大力水手〉，《中華日報》，臺北，1968年1月3日，版10。

<sup>38</sup> Jay Taylor（陶涵），*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21.

<sup>39</sup> 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頁252。



自認「沒有惡意」，恐怕是他對情治人員、甚至是蔣經國或蔣介石的幽默感過於高估。幽默的表現方式之一，是無傷大雅的戲謔嘲諷，如果純係自嘲，或可搏君一笑；如果是譏諷他人，難保沒有惹惱當事人的風險。將卜派的競選演說翻譯成「告全國同胞書」，柏楊不至於天真到相信情治人員看不出其間的連結和諧仿性（parody）。諧仿的本質其實即為模仿與嘲弄，柏楊斗膽在1960年代的時空環境下拿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流落到一座小島的劇情開玩笑，只能說，這樣的行為要不是他對於政治肅殺欠缺警覺心，或者就是他太過高估蔣氏父子的幽默感與包容心。當柏楊在深夜中完成譯文，並將之塞進送稿袋時，他就應該了解自己已經將身家性命曝露於不可測的政治迫害和追殺之中。硬要說柏楊天真到不了解他所身處的白色恐怖環境，似乎難以取信於人。因此不妨說，他真的是對蔣氏父子的心胸與雅量太過掉以輕心，以為獨裁者不會計較這種無傷大雅的戲謔和嘲弄。但是他真的錯了。

本文用意不在苛責柏楊，因為就法律層面而言，拿大力水手卜派流落荒島來諧仿蔣氏父子，純屬言論自由的範疇，甚至連毀謗都稱不上。以漫畫諷喻時政，這在民主國家，原本是稀鬆平常不過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柏楊被捕下獄之後，並不以「污蔑元首」之類的罪名起訴，而係透過嚴刑拷打，逼迫他承認曾加入中國新政協八大黨派之一的中國民主同盟。<sup>40</sup> 由於中國民主同盟被當時國民黨認定為中共的「外圍組織」，也因此符合了刑法一百條所謂「意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之要件，並進而適用「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唯一死刑），及第二條第三項：「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按照日後柏楊的判決書來看，不論是警備總部的初判或是國防部的覆判，隻字不提任何與「大力水手」漫畫有關的情節。理由很簡單，翻譯或是改寫「大力水手」，完全構不上叛亂罪，按照當時由行政院發布的「臺灣省戒嚴時期軍法機關自行審判及交法院審判案件劃分辦法」（1968年），根本輪不到軍法機關審理。<sup>41</sup> 然而，由下文我們將會發現，柏楊在1968年3月4日遭到逮捕，原因正在於其翻譯的「大

<sup>40</sup> 參見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頁257-272。

<sup>41</sup> 根據1967年9月4日行政院修正公布的「臺灣地區戒嚴時期軍法機關自行審判及交法院審判案件劃分辦法」，除了軍人犯罪、涉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及「懲治叛亂條例」，以及觸犯「陸海空軍刑法」、「懲治盜匪條例」、「戰時交通電業設備及器材防護條例」等相關條文者，方交由軍法機關審判外，其餘案件一律交由法院審判。

力水手」遭到檢舉。所以被檢舉事項既然無從構成罪責，亦難以牽連引申，那麼，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另找事由，誣陷嫌疑人加入叛亂團體，「意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這樣的劇本在1949-1992年間的白色恐怖期間，<sup>42</sup> 原本屢見不鮮。我們從柏楊的案子，再次見證了白色恐怖之所以令人聞風喪膽的原因。

## 肆、鴟梟並起

根據國安局解密並移交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度藏的一批柏楊案檔案來看，最早注意到漫畫內容有問題的單位，似乎是負責文化宣傳工作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以下簡稱「中四組」），以及警備總部。因為當警備總部在1968年1月10日去函《中華日報》社要求查覆此事時，中四組也同時指示《中華日報》將「大力水手」原稿及1月1日至1月5日之剪報「專案呈報」。<sup>43</sup> 當然，中四組也可能係由《中華日報》方面主動告知，因為該報編輯部在1月3日便發現有問題，因而自1月6日起該報便以「續稿未到」為由，停刊了這則主題漫畫。等到1月8日恢復連載時，已是另外別的故事。<sup>44</sup>

事實上，受到這起事件驚動的還不止國民黨中四組、警備總部而已，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即今之法務部調查局，以下簡稱「調查局」）和臺灣省警務處稍晚也注意到了這件事。1968年1月17日，調查局在彰化及屏東分別有線報檢舉這件事，隨後調查局在1月21日呈給國安局一份「通報」，指出「中華日報刊載不當

<sup>42</sup> 臺灣歷史上的「白色恐怖」時期，本文定義始自1949年5月臺灣省戒嚴令的頒布，由於實施戒嚴，一般人民（憲法第九條所規範之「非現役軍人」）於「接戰地域內……軍事機關得自行審判」（戒嚴法第八條）。至於白色恐怖的結束，則以1992年5月刑法一百條的修改為標誌，由於刑法一百條的修改，終結了思想犯罪、言論叛亂等等的國家暴力。

<sup>43</sup> 「警備總部致國安局函」（1968年2月26日），〈郭衣洞案〉，《國安局》，檔號：A803000000A/0057/C280206/0001/01/057。

<sup>44</sup> 《中華日報》社在1968年1月16日回函給警備總部時，特別自承該社：「因發現元月三日該譯載之文字，似有未盡妥善之處，乃立即加以檢查，並於六、七日以前『續稿未到』為由，終止該漫畫刊出，八日起繼續連載。」參見「警備總部民國五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致國安局函」（1968年2月26日），〈郭衣洞案〉，《國安局》，檔號：A803000000A/0057/C280206/0001/01/057。

漫畫」，「含有影射譏諷 元首之意」。<sup>45</sup> 臺灣省警務處則在同年2月12日將1月1日至1月5日間《中華日報》所連載之大力水手漫畫剪報，送達國安局。臺灣省警務處處長黃對墀在公文中指出，該漫畫「似有影射之意」。<sup>46</sup> 可以說，從國民黨中央到各主要情治機關（國安局、警備總部、調查局、臺灣省警務處），都已經嗅聞到了這則漫畫背後豐富的政治訊息。

1968年3月4日，調查局人員前往柏楊家中將他帶走，經過四個月的審訊和屈打成招，1969年7月31日，警備總部軍事法庭判決柏楊「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處有期徒刑十二年。由於柏楊在口供中提到1948年底瀋陽遭中國共產黨占領之際，一位友人孫建章曾與他一同逃離東北，使得當時在苗栗縣警察局任職督察的孫建章亦遭牽連，被辦案人員誣陷曾與柏楊一起接受共產黨組織訓練，判交付感化三年。<sup>47</sup>

柏楊被捕，大力水手漫畫當然是重要原因，卻並不是唯一理由。更複雜的因素還在於柏楊被捕的前十年間，任職於《自立晚報》，不時撰寫專欄批評官場與社會的黑暗面。這一點著實觸怒了國民黨當局。<sup>48</sup> 據國安局檔案中一份缺少案由、首頁，僅浮貼在公文稿上的便簽顯示，有線報指出3月15日（柏楊被捕後十一日）：

下午有部份立委在議場談及柏楊被捕現正在軍法審判中之情形，他們認為柏楊前幾年的作品確有問題，據聞後來經過安全局派員與他談過一次話以後，他的態度已轉變過來，近年來他的作品已好得多了，並未發現他有偏激的文字出現。他們對此次柏楊因何事被捕都不清楚。<sup>49</sup>

<sup>45</sup> 「調查局情報報告（通報）」（1968年1月21日），〈郭衣洞案〉，《國安局》，檔號：A803000000A/0057/C280206/0001/01/061。

<sup>46</sup> 「臺灣省警務處致國安局函」（1968年2月12日），〈郭衣洞案〉，《國安局》，檔號：A803000000A/0057/C280206/0001/01/059。

<sup>47</sup> 有關這部分經過，柏楊在回憶錄中有詳細的敘述，參見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頁257-284。

<sup>48</sup> 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頁233-235。

<sup>49</sup> 「便簽」（1968年3月16日），〈郭衣洞案〉，《國安局》，檔號：A803000000A/0057/C280206/0001/01/052。原件係手寫，字跡十分潦草難辨，以上引述內容係經筆者辨識後謄抄，若干用字容或有錯，文責由筆者自負。

看來柏楊被捕之前，他在報紙上發表及出版的雜文集，確實已經引起情治單位的注意。<sup>50</sup> 也因此在他的案件經軍事機關審判定讞後，他所有的著作開始一一遭到查禁。然而，從國安局這批解密檔案看來，他的收押和判刑無疑仍以大力水手漫畫之翻譯為導火線和最重要原因。要不是因為這則漫畫引起情治機關和遍布臺灣社會的檢舉密報系統騷動，那麼，之前他在媒體報紙上所寫的「偏激言論」，頂多就像立委們閒聊時所說，引來安全局派員向他表達關切，還不至於造成滅頂之災。在此讓我們意識到在臺灣的白色恐怖時期，其實有一道看不見的紅線，不小心踩到便有立即的危險。但是這道紅線究竟畫在哪裡，受到相當複雜的政治、社會、權力、文化，甚至族群等等因素影響，因此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判斷。柏楊在那樣的環境浸淫日久，按理不會對相關風險一無所悉。或許依他判斷，翻譯區區一則大力水手，殺傷力比不上他在報端的冷嘲熱諷，因此一開始完全沒有警覺，還心安理得上床睡覺。

藉由翻譯一則外國漫畫，對蔣氏父子做些冷嘲熱諷，識者頂多會心一笑，實在沒必要搞到置人於死的地步。相信一天到晚接收到各種告密、檢舉、真假情報的大小情治單位，不管是警備總部、調查局、臺灣省警務處，甚至是國民黨中央第四組、第五組，應該也不是對於每件舉報都全力以赴、偵辦到底。但是，何以獨獨對柏楊的大力水手漫畫案，非要上綱上線到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簡稱「二條一」）起訴他不可？<sup>51</sup> 這就很難不令人聯想到蔣經國，甚至是蔣介石本人的角色。從以下敘述，吾人將看到蔣經國如何在第一時間便獲悉此事，並介入主導整個案件的偵辦過程。但是蔣介石本人究竟知不知道？以及有沒有下令做任何處置？依目前所見文獻，並無確切證據。

<sup>50</sup> 前法務部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在回憶錄中，亦證明當時調查局早已「盯上」柏楊。高明輝指出，在「大力水手」事件爆發之前，調查局即已下令幹員針對柏楊的著作「找出毛病」。高明輝說：「這個時候我已心知肚明，知道柏楊可能要倒楣了。」高明輝同時將柏楊案與雷震案相提並論，認為這兩個案件，都是「先決定辦人，再去找理由或證據」。參見高明輝，《情治檔案：一個老調查員的自述》（臺北：商周文化事業公司，1995年），頁294-295。

<sup>51</sup> 所謂「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條文內容為：「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這是一條屬於「唯一死刑」的法律，在1950年代臺灣白色恐怖期間，被依這條法律起訴的犯人，大多難逃被槍斃的命運。因其極具象徵性的鎮懾效果，因而獲得了「二條一」的謔稱。

## 伍、蔣經國的角色

按照柏楊自己的理解，他之所以被逮捕、起訴，而且被以「懲治叛亂條例」中的「二條一」起訴，真正原因就是：「蔣經國要殺我」。<sup>52</sup> 而他在綠島、泰源監獄等處服刑期滿之後，仍遲遲無法獲釋回臺，原因也在於蔣經國不願意放他走。柏楊對此有十分戲劇化的描寫：

幾個月後的一天，忽然全營警戒，……警備司令部政戰部主任韓守湜將軍前來視察……。大概一個半小時後，一位組長跑步進來，呼喊我的名字，一面說：「主任召見你，快換像樣一點的衣服！」……一見面，我除了向他致謝外，就直接了當的問：「我還有沒有希望出去？」

他謹慎的說：「我不知道，如果你是被管訓的流氓，我今天就可以帶你走。」

「警備司令部難道還管不到我的案子？什麼機關管到我的案子？」

「你應該往上面想。」

「國防部？」

「更要向上。」

「那麼……」

「不要談了，我只能向你保證，你在指揮部期間，我們對你絕對優待。不過，我建議你，每個月寫一份讀訓心得，實際上這對你沒有一點幫助，但是，一旦有人幫助你的話，可供給他一個很好的台階。」<sup>53</sup>

韓守湜在話裡所提到的「他」，究竟是誰？答案似乎已呼之欲出，不是別人，就是蔣經國。至少，柏楊本人的理解和陳述是如此。然而，有沒有辦法從政府檔案中證明這個推論？

2004年5月，由監察院所公開出版的《郭衣洞叛亂案調查報告》（以下簡稱《調查報告》），已經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詳細的說明。<sup>54</sup> 該書所引用的政府檔

<sup>52</sup> 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頁274-275。

<sup>53</sup> 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頁331-333。

<sup>54</sup> 趙昌平、林時機調查，監察院國防及情報委員會編，《郭衣洞叛亂案調查報告》（臺北：



案，同樣來自於國安局、國防部後備司令部（即原警備總部檔案）、調查局所典藏之案情公文。監察院之所以動手調查本案，係由於柏楊本人之陳情。<sup>55</sup> 經監察委員趙昌平、林時機耗時一年餘的查證，所得到的重要「調查事實」之一，便是：「本案偵查、起訴及判決之權責機關於偵審前後皆將案情陳報國安局或蔣部長、蔣副院長核示」。<sup>56</sup> 《調查報告》對此有相當詳細的文獻徵引：

就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五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函，國安局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內簽：「擬辦：專報部長」，局長批示：「俟偵辦有結果再報部長。」

調查局於取得郭衣洞曾於瀋陽「民主建設學院」受訓之供詞後，即以五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五七）中（四）五〇〇五二七號代電函報國安局郭衣洞供述情形。國安局即於同年三月三十日摘要專報部長「鑒警」……

國安局於同年六月十一日函報部長「鑒警」，內容除引調查局之移送書內容外，另稱：「……」，函文上有同年六月十二日「經」批示。國安局以五十七年六月十二日（五七）宏治字第四二二九號函復調查局：「郭衣洞在台有無吸收人員為匪工作及發展組織情事，仍請繼續審訊見告為荷。」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軍事檢察官偵查終結後，以……檢附起訴書原本、案卷十一宗、証物三件報國安局：「惠賜卓見。」……國安局五十七年七月四日內簽除引起訴書概要外，說明欄：「本案交付法辦前曾奉准部長核可在案。」<sup>57</sup>

監察院《調查報告》在這一大段文字中所提到的「部長」，以及「經」字的批示，事實上就是蔣經國本人。當1968年3月柏楊遭逮捕，以及之後長達一年多的偵訊、審判，當時蔣經國的職務是國防部長。1969年6月25日，蔣經國

---

監察院，2004年）。

<sup>55</sup> 趙昌平、林時機調查，監察院國防及情報委員會編，《郭衣洞叛亂案調查報告》，頁1。

<sup>56</sup> 趙昌平、林時機調查，監察院國防及情報委員會編，《郭衣洞叛亂案調查報告》，頁189-192。

<sup>57</sup> 趙昌平、林時機調查，監察院國防及情報委員會編，《郭衣洞叛亂案調查報告》，頁190-191。

升任行政院副院長。<sup>58</sup> 也因此警備總部在柏楊案宣判前夕的1969年7月19日，特地將「擬判刑期十二年」的處置方式呈報給蔣經國，使用的頭銜變成「蔣副院長」。<sup>59</sup> 總而言之，柏楊案從頭到尾都有蔣經國介入的跡象，已是不爭的事實，不僅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對此指證歷歷，而且藉由國安局解密檔案的檢視，更可說鐵證如山。<sup>60</sup> 圖1的這頁檔案，便是國安局1968年4月29日上給「部長」的一份簽呈。由這份檔案，讀者不僅可以看到蔣經國在柏楊案中扮演的角色，而且還能夠進一步解讀蔣經國在當時臺灣情治系統中的權力與地位。



圖1、國安局局長周中峯就柏楊案偵辦情形呈蔣經國公文

資料來源：「國安局局長周中峯就郭衣洞案偵辦情形呈部長公文」（1968年4月29日），〈郭衣洞案〉，《國安局》，檔號：A803000000A/0057/C280206/0001/01/036。

<sup>58</sup> 國史館徵校處時政科編，《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錄——自行憲至民國六十七年五月》（臺北：國史館，1988年），頁577、595。

<sup>59</sup> 趙昌平、林時機調查，監察院國防及情報委員會編，《郭衣洞叛亂案調查報告》，頁191。

<sup>60</sup> 事實上，在1965年蔣經國出任國防部長之後，國安局就個別政治案件向「蔣部長」呈報的例子尚不止柏楊一案，從知名廣播主持人崔小萍的檔案中，同樣可以看到國安局上給蔣經國的案情報告公文。參見「中廣廣播崔君案偵查結果」（1968年9月6日）〈崔小萍案〉，《國安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803000000A/0057/C280207/0001/01/006。由於崔小萍案非本文所欲探討主題，因此不多作贅述。

在這頁檔案中，藉由核判人的簽名，可以看出這是當時國安局局長周中峯親自發出的公文。公文內容並不特別，只有簡單兩點：

1. 據調查局4月24日呈報郭衣洞案偵處情形如次：「照抄下簽引號內原文」等情。
2. 「除續注意追訊有關涉嫌情況外，恭請 鑒督」。

這只是一份例行性的報告，目的是向收文者「部長」呈報有關調查局偵訊郭衣洞（柏楊）的情況。公文按照調查局的報告「照抄下簽引號內原文」，顯然在這份公文後面，應該還有一份附帶的調查局報告書，只是筆者向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申請到的資料內容，看不到這份報告書。然而，看似平淡無奇的第二點：「除續注意追訊有關涉嫌情況外，恭請 鑒督」。從檔案圖像中很明顯可以看到，原本公文承辦人員在擬稿時寫的是「敬請」，但是核判人周中峯局長刻意將「敬」字改成了「恭」字，使得這份簽呈更顯得畢恭畢敬了些。<sup>61</sup>

究竟是哪一位「部長」，需要國安局局長周中峯如此畢恭畢敬？上引監察院有關柏楊案的調查報告已經解釋得夠明白了，就是國防部長蔣經國。國安局成立於1955年，1967年2月之後其在體制上直屬於國家安全會議。<sup>62</sup>而國家安全會議則為總統親自領導的決策機制。<sup>63</sup>國安局同時肩負對國內整個情治系統督導協調的任務，包括專責國內政治偵防工作的調查局，以及負責軍事戒嚴任務執行的警備總部。國安局局長的權力，非同小可，因此大權在握的周中峯，大可不必對行

<sup>61</sup> 把公文稿中「敬請」二字改成「恭請」的人，究竟是國安局局長周中峯本人，或是公文簽呈過程中的其他經手人，讀者可以透過筆跡自行判斷。筆者根據周中峯留在文稿中的草寫「發」字，和他本人「中峯」的簽名，尤其是「四·廿九」諸字的筆法，以及幾個公文經手人用筆墨色之不同，認定修改後的「恭」字，十之八九係周中峯親筆。而且周中峯是文稿核判人，他對於將「敬請」改成「恭請」無疑是贊成的。

<sup>62</sup> 依據總統令在1967年2月1日公布的「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組織綱要」第七條規定：「國家安全會議設國家建設計劃委員會，國安局，國家總動員委員會，戰地政務委員會，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等機構……。」參見「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組織綱要」（1967年2月1日），《總統府公報》，第1824號（1967年2月），頁2。

<sup>63</sup> 有關1955年國安局成立之經過，參見蕭李居，〈國防會議的設置與法源初探（1952-1967）〉，收入黃翔瑜編，《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414-419。

政院轄下的一位部會首長，如此畢恭畢敬。相反的，應該是這位「部長」對周中峯敬畏三分才對。更何況，由國安局局長向國防部長鉅細靡遺呈報一件偵辦中的匪諜叛亂案，在行政權責和制度倫理上都是說不通的。

更有趣的是，這份公文右上角的「文別」欄，標注的不是「函」，而是「呈」。國安局直屬國家安全會議，而國防部隸屬於行政院，兩者間公文往來應該是「函」，而不會是「呈」。例如同樣發生在1968年的柳文卿事件，<sup>64</sup> 在柳文卿被日本政府強制遣返臺灣之後，引起日本社會輿論關心，周中峯與外交部長魏道明之間有若干公文往來，其文別均為「函」而非「呈」。<sup>65</sup> 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同為國家安全會議之法定成員，<sup>66</sup> 何以周中峯發文給魏道明是「函」，而寫給蔣經國卻是「呈」？

如果一定要為周中峯作些辯護的話，也許有論者會指出，蔣經國自1954年9月5日起即擔任國家安全會議前身「國防會議」副秘書長長達十二年。<sup>67</sup> 1967年2月，國家安全會議成立之後又被任命為該機構轄下國家總動員委員會的主任委員，<sup>68</sup> 周中峯發給蔣經國的公文，文別為「呈」或無不妥。然而，依據「國家安全會議組織綱要」第七條的規定：

國家安全會議設國家建設計劃委員會，國安局，國家總動員委員會，戰

<sup>64</sup> 1968年3月26日，旅日的「臺灣青年聯盟」成員柳文卿欲向東京入國管理局辦理簽證延期，卻遭日本政府強制遣返臺灣，被稱作「柳文卿事件」。事件經過，參見嚴婉玲、陳翠蓮，〈1960年代政治反對人士強制遣返政策初探——以柳文卿案為中心〉，收入黃翔瑜編，《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873-905。

<sup>65</sup> 「國安局就柳文卿案案情致外交部函」（1968年5月23日）及「國安局就臺灣省警務處代電轉知外交部函」（1967年12月30日），〈柳文卿案〉，《國安局》，檔號：A803000000A/0056/C280208/0001/01/013、A803000000A/0056/C280208/0001/01/026。

<sup>66</sup> 依據「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組織綱要」第六條規定：「國家安全會議以副總統、總統府秘書長、參軍長、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副主任、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國防部部長、外交部部長、財政部部長、經濟部部長、參謀總長、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及總統指定之人員組成之，經常出席會議。」參見「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組織綱要」（1967年2月1日），《總統府公報》，第1824號，頁2。

<sup>67</sup> 蕭李居，〈國防會議的設置與法源初探（1952-1967）〉，收入黃翔瑜編，《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413。

<sup>68</sup> 〈國家安全會議三委員會正副主委人選發表〉，《中央日報》，臺北，1967年2月7日，版1。

地政務委員會，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等機構，依其性質，策劃協調督導考核及執行有關之業務，其組織另定之。<sup>69</sup>

事實上，國安局與國家總動員委員會各為國家安全會議轄下的兩個平行單位，各職所司，何來國安局局長向國家總動員委員會主委「呈」遞公文的道理？重點是此時國防會議早已裁撤，國防部長蔣經國在體制上絕非國安局上司，周中峯向蔣經國發送的公文依然使用「呈」，表現出來的是1990年代以前兩蔣威權統治時代的特殊政治文化與肢體語言。

簡言之，身分特殊的蔣經國，不論他所擔任的職務是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國防部部長；或者是1969年夏天之後的行政院副院長，被他納入個人勢力範圍內的情治機關與國軍政工系統，對蔣經國表現出的已不是基於職務和體制的服從，而係近似於對個人的效忠。<sup>70</sup>藉由柏楊叛亂案偵辦過程中的一份不起眼公文，我們看到了臺灣在1990年以前的威權時代，政府官員如何將原本應該表現為對國家和憲法的效忠，轉移成為對個人及其家族的效忠。

## 陸、國家權力的私有化與家族化

蔣經國去世三十多年來，臺灣經歷了民主化、威權體制的緩慢崩解、政黨輪替，最終來到追求轉型正義的進程。無庸置疑，1949年之後在臺灣建立起威權統治體系的決策者是蔣介石。兩蔣威權統治得以傳承至第二代，屹立近四十年而不動搖，筆者認為賴以支撐者有六道支柱，分別是：（1）萬年總統；（2）萬年國會；（3）戒嚴體制；（4）刑法內亂罪；（5）恩庇侍從結構之地方基礎；（6）以黨領政之國民黨黨機器。<sup>71</sup>這六項保障威權統治得以貫徹及執行的制度性因素，皆完成

<sup>69</sup> 「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組織綱要」（1967年2月1日），《總統府公報》，第1824號，頁1。

<sup>70</sup> 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在第柒部分「調查意見」中，亦提出類似看法：「郭衣洞案於起訴、判決前，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皆先陳報國安局核可，並轉報，或逕陳蔣先生、部長、蔣副院長……，有違軍事審判法之相關程序規定，難脫人治色彩。」參見趙昌平、林時機調查，監察院國防及情報委員會編，《郭衣洞叛亂案調查報告》，頁298。

<sup>71</sup> 李福鐘，〈兩蔣威權統治的地方基礎——兼論「以政養黨」與選舉舞弊〉，收入吳淑鳳等



蔣介石執政期間，尤其是1960年透過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達成的總統三連任，亦即「萬年總統」之形成，致令最高統治權的更迭無從實現，並使得蔣介石可以好整以暇安排其子接班，形成幾達四十年的蔣氏家族統治。

在此將試圖檢討兩個問題，兩者雖然各自獨立，卻也經常相互纏繞，互為表裡：一是蔣經國在白色恐怖期間所扮演的角色與責任；二是兩蔣威權統治如何造成政府公器與國家權力淪為私相授受之家族利益——理應遵循法律規範的政府體制，出現由蔣氏家族「世襲化」的傾向。

正如上文所言，蔣經國在白色恐怖中的角色，在1961年孫家麒出版《蔣經國竊國內幕》一書之後，基本上已有大致之輪廓。只是往後六十年相關研究並無太大進展，我們對於蔣經國如何指揮、調度情治單位，而情治單位又如何接受蔣經國的領導，並沒有進一步突破性的理解。本文利用柏楊案的國安局原始檔案，試圖說明一個現象，即蔣經國在1972年出任行政院長以前，不論其個人政府職務為何，情治機關向他報告重大案情時，遵循的並非正常行政程序，而是近似於對「個人」的服從與效忠。正如上文披露，柏楊案發生時蔣經國職務為國防部長，之後長達一年餘的偵訊過程，國安局定期以「呈閱」格式的公文書，向蔣部長報告進度。俟1969年6月蔣經國升任行政院副院長，國安局並不向新任國防部長黃杰報告案情，而是持續向蔣副院長報告。同樣的道理，1965年1月13日之前蔣經國的職務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防部副部長，<sup>72</sup> 國安局重大情治業務也並非向當時國防部長俞大維報告，而是由蔣經國掌握。<sup>73</sup> 總而言之，不論蔣經國的職務為

---

編，《臺灣歷史上的選舉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20年），頁477-480。

<sup>72</sup> 蔣經國於1964年3月以行政院政務委員身分兼任國防部副部長，至1965年1月13日接任國防部長。

<sup>73</sup> 對兩蔣時代國民黨高層政治生態相當熟的唐治國，在其著作中披露了一件秘辛，即1955年國安局成立後，昔日「軍統」內地位僅次於戴笠的大老鄭介民被任命為第一任局長。然而，蔣經國在國安局內也有一間不起眼的辦公室，活像是茅棚式的違章建築，但所有國安局「重大的政策性決定，都是在這間小屋中做成，局長辦公室批出的公文，非經過這間小房間複核不生效力」。可以說，這即是蔣經國以國防會議副秘書長一職節制國安局工作的模式。參見唐柱國，《最高機密：高階諜報員首度公開國民黨情報秘史》（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頁7-8。鄭介民在1959年12月病逝於任內，由原國安局副局長陳大慶升任局長，二人都是黃埔一期的畢業生。從蔣經國1950年出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到1954年9月出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再到1964年以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防部副部

何，中華民國情治機關並不是依照政府體制或業務隸屬接受上級機關領導，而是持續由特定人士指揮。這個現象說明了國民黨情治系統在中國大陸時期（1928-1949）唯一效忠對象的蔣介石，於1950年之後，正以一種違背正常憲政體制運作的方式，將相關權力世襲並移交給自己的長子。

在過去三十年來有關國民黨黨國體制的研究中，「以黨領政」的現象雖然較多被注意到，<sup>74</sup> 但是國家權力被蔣氏家族以特定個人「家族化」、「世襲化」的現象，至今尚缺少系統性的整理分析。事實上，不止蔣經國，宋美齡在外交領域的影響力，也已經到了以裙帶政治（nepotism）侵奪國家權力的程度。<sup>75</sup> 類似情事，甚至到了蔣家第三代，也就是蔣介石的孫輩，依然層出不窮。1978年1月22日，仍擔任行政院長但即將獲得國民黨提名為第六屆總統候選人的蔣經國，在日記中留下如此記載：

沈之岳竟兩次面薦孝武為調查局局長，聞之一驚，沈某幼稚到如此地步，否則就是別有用心，或者對我之為人與人格無認識。無論如何，此事不能責沈，而余應自反自省者多矣。<sup>76</sup>

沈之岳自1964年起長期擔任調查局局長，1978年1月退休，一位65歲即將卸任的調查局局長，竟然推薦年僅33歲且無任何政府公職經歷的蔣孝武接替自己職位，確實不可不謂怪異。依正常之人情事故推斷，沈之岳推薦蔣孝武，不可能不事先徵得蔣孝武本人同意。<sup>77</sup> 同時，當沈之岳向蔣經國詢問此一可能性時，沈心

---

長，相信國安局歷經鄭介民、陳大慶兩任局長，重大業務和政策都還是由蔣經國掌握，而不會發生鄭、陳兩位上將局長向國防部長俞大維「呈報」局務的情事。

<sup>74</sup> 例如松田康博，《台灣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6年）；或是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

<sup>75</sup> 這方面的研究並不多，趙席寶的研究指出中日戰爭期間胡適擔任駐美大使，以及二戰結束後顧維鈞擔任駐美大使期間，宋美齡皆透過其親族，包括宋子文、孔祥熙，以及宋美齡的親信陳之邁，直接干預中華民國政府對美國的外交工作。參見趙席寶，〈胡適與蔣介石關係的探討〉，收入胡春惠、呂紹理主編，《2011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2年），頁399-412；趙席寶，〈1950年代的蔣介石與顧維鈞〉，收入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4年），頁480-485。

<sup>76</sup> 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頁211。

<sup>77</sup> 依常理判斷，沈之岳會開口向蔣經國試探此一人事安排，必然事先得到蔣孝武同意。至於

中所考慮者絕非該人選的才能、學識，或是推動政務所必需，而僅因為蔣孝武是蔣家第三代最有「接班」企圖心的人物。<sup>78</sup> 所以不論蔣孝武或沈之岳，明顯皆未將政府職位視為國家公器，而近似於當成家族利益，可以私相授受。這是為什麼蔣經國在日記中會留下「無論如何，此事不能責沈，而余應自反自省者多矣」等語句的原因。即將退休的調查局局長為現任行政院長的兒子說項，欲破格出任中華民國最重要情治部門之一的首長。身為父親，同時也是中華民國實際上的最高決策者，難道蔣經國不該為沈之岳的這一怪異人事舉薦「自反自省」？

出於尚不得知的考量，蔣經國並未任命他的次子出任調查局局長，而是於1980年任命蔣孝武為國民黨黨營企業中國廣播公司（簡稱「中廣」）總經理。就這項人事安排來說，不可不謂蔣經國仍有意讓蔣孝武在個人歷練和資歷上更上一層樓。尤其中廣公司乃國民黨黨營企業，非政府機關，較不至於落人口實。結果蔣孝武出任中廣總經理後，隨即在隔年（1981）2月行文國防部，以中廣公司承辦政府多項委託任務為藉口，要求調派憲兵負責中廣公司仁愛路總部大門及雲林、屏東二處發射站之警衛工作。國防部各級承辦人員不敢擅自作主，擬了甲、乙兩案，甲案是「准予所請」，乙案則是請中廣公司仍一如既往慣例，自行聘請民間警衛人員執行相關業務。結果公文送到參謀總長宋長志手上，宋長志批示：「甲案」。<sup>79</sup>

中廣公司固然接受政府委託對中國大陸進行心戰廣播，然而，國防部派遣憲兵在民營企業門口站衛兵，畢竟是於法無據的事情。蔣孝武敢於向國防部提出這一要求，顯然不全因為中廣是國民黨的黨營企業，因為其他同為黨營企業的機構並未比照辦理，譬如中央電影公司、中央日報社、中央投資公司等等，而純係由

---

蔣孝武的動機，詳下文分析。

<sup>78</sup> 這一點曾經擔任過蔣介石六年侍從武官、和蔣家成員接觸相當頻繁的汪希苓，曾予以證實。汪希苓說：「蔣孝武野心很大，有著接下乃父政權棒子的企圖。」當汪希苓作此表述時，自認為對蔣孝武的「言行乃至於心中所思」，有相當了解。參見汪士淳，《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頁198。

<sup>79</sup> 「中廣請求派遣憲兵維護該公司警衛工作」（1981年2月26日），〈憲兵警衛勤務案〉，《國防部》，國防部藏，檔號：70/0554.2/3033。須稍加說明，在2000年1月立法院通過「國防法」之前，屬於「軍令」業務的軍中兵力配置係由參謀總長直接向總統負責，因此國防部有關中廣公司要求調派憲兵的公文，由參謀總長宋長志批核。2000年之後軍政、軍令系統一元化，該項職權已回歸國防部長。

於他是蔣經國次子。國防部派遣憲兵在中廣公司門口站崗一事，地點發生在臺北市仁愛路三段通衢大街上，很難不引人側目，然而亦未見蔣經國予以駁斥制止。

蔣經國去世多年來，若干他的舊部、僚屬，試圖為蔣經國實際領導全國情治工作一事卸責，最簡單的藉口，就是所有的錯誤都是情治機關人員執行時的偏差，只不過帳都算到了蔣經國頭上，「冤哉枉也」。<sup>80</sup> 甚至，從1944年4月在四川省重慶市入學國民黨中央幹部學校起即稱呼蔣經國為「教育長」的李煥，還曾針對柏楊案為蔣經國開脫，李煥親口對柏楊解釋：「你被拘禁、審訊、用刑，我相信你說的都是事實，但這不能解釋為是蔣經國要他們整你。」<sup>81</sup> 李煥1990年代後期接受口訪時，依然刻意撇清蔣經國的相關責任：

其他黨政軍負責人的行事，不是他所能左右的。以情治工作為例，調查局和警備總部各有系統，他並未負責直接指揮，至多只是代蔣中正總統傳達指示，不應把所有責任推到他身上。<sup>82</sup>

然而，經由對國安局柏楊檔案的梳理，我們所看到的歷史事實並非如此。蔣經國或許並未親自下命調查局人員刑求毆打柏楊，但在蔣經國要求國安局定期彙報偵查進度的壓力下，調查局人員以刑求逼供，蔣經國的責任是開脫不掉的。歷史上所有的獨裁者確實都可以因為沒親自沾手「骯髒的工作」（dirty works）而為自己喊冤，但這並不能證明自己並非獨裁者。當蔣經國要國安局隨時彙報柏楊案偵查進度時，他即已心知肚明柏楊會遭受如何的對待。

## 柒、兩蔣威權統治的世襲特徵——代結論

正如本文於前言所述，並非全世界所有威權政體都擁有龐大的情治特務系統，尤其是蔣介石的特務體制存在時間之長，甚至可以追溯自1928年國民黨完成

<sup>80</sup> 漆高儒，《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北：正中書局，1998年），頁169。

<sup>81</sup> 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頁82。

<sup>82</sup> 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頁83。



北伐之日起。<sup>83</sup> 其體系不僅堪稱龐然大物，甚至因其規模巨大而可以對臺灣社會進行鋪天蓋地的監控。就此而言，兩蔣政權確實是全球威權主義中相當特殊的案例。鄭敦仁固然試圖以「準列寧式威權主義」來解釋，不過蔣介石政權龐大的情治建制源頭真的來自於1920年代初期仿效俄國布爾什維克黨而出現的產物？還是說1930年代的某個時期，因為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個人派系亟思效法義大利及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因而催生了國民黨內最惡名昭彰的特務機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sup>84</sup> 這個問題雖然複雜，但卻相當重要，因為累積五十年來有關兩蔣威權體制的研究，卻對於該政權究竟在威權主義系譜中具有何種特性，遲遲未有進一步的分析。

所謂的威權主義政體，在理論面上與民主政治、極權主義政體一樣，都具備著所謂「現代性」（modernity）的特點，<sup>85</sup> 因此與「傳統型」的前現代政治體制截然不同。所謂「現代／傳統」的區別界限，借用波蘭裔美國政治學者Amos

<sup>83</sup> 國民黨最早的特務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其前身即可以追溯到1928年設在該黨中央組織委員會下的「調查科」，由陳立夫兼任科長，1929年改由徐恩曾擔任科長。參見胡性階，〈中統沿革〉，收入陶蔚然、胡性階等著，《親歷者講述中統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頁22-23。

<sup>84</sup> 「軍統」的重要骨幹事實上來自於國民黨內的法西斯小團體「復興社」，尤其是復興社內的核心「力行社」。此點不管是軍統人員的歷史證詞，或是相關學術研究，都給了十分肯定的論述。參見馮啟宏，《法西斯主義與三〇年代中國政治》（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8年），頁153-222；程一鳴，〈軍統特務組織的真相〉；康澤，〈復興社的緣起〉，收入沈醉、康澤等著，《親歷者講述軍統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頁1-24、45-56；陳敦正，〈復興社·青白社·藍衣社——一個「復興社」參加者的自述與觀察〉，收入干國勳等著，《藍衣社 復興社 力行社》（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45-79；Lloyd E. Eastman,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 1927-1937," in Lloyd E. Eastman, Jerome Ch'en, Suzanne Pepper, Lyman P. van Slyke,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8-32; 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57-162.

<sup>85</sup> 所謂「現代性」，借用德國社會哲學家韋伯（Max Weber）的概念，係指近代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之後，圍繞著資本企業（capitalist enterprise）和官僚化國家（bureaucratic state）逐步分殊並形成穿插交錯的雙功能性系統，一旦這樣的社會結構成形，便可稱之為「現代」社會。有關「現代性」的概念雖可追溯至黑格爾（Georg W. F. Hegel），但將之理論化並產生深遠影響，無疑歸功於韋伯。有關「現代性」的簡要詮釋及其哲學演進，參見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87), pp. 1-22.



Perlmutter的說法，在於「集體性」（collectivity）的特徵，按照他的說法：

現代威權主義與早前的概念有一個非常清楚的區隔，<sup>86</sup> 早期版本係藉少數人之名由少數人統治；現代威權主義係藉多數人之名由少數人統治。現代的威權主義尤其在政治支持、控制、動員與意識形態的範疇和型態上更為凸顯。我寧可使用威權主義一詞勝過於專制……因為這是一個現代名詞，而且意謂著集體性。……現代威權主義依賴政治菁英、羣眾支持、政治動員，……尤其是仰賴特殊的政治結構與建制。<sup>87</sup>

人類近代政治史上出現的民主政治與極權主義，毫無疑問都帶有現代性的特徵。而當胡安林茲1960年代鑽研於威權主義理論時，無疑也意識到該類型政權與十九世紀以前的「傳統支配型態」本質上必須有所不同，否則不足以釐清普遍存在於當代世界的這一類型政體的本質。

既然如此，國民黨政權在二十世紀漫長的演化過程中，一方面在1924年仿效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組織，建立了「準列寧式革命政黨」架構；另方面又吸收1930年代義大利及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因子，極力擴充其龐大的特務體系；同時，在國民黨1925年7月於廣州成立國民政府之後，其黨國形態持續往官僚化國家（bureaucratic state）方向演進，使其本質上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性之政權，與1912-1928年間散布於中國各省以個人效忠及軍隊私人化為特徵的所謂「軍閥」政權迥然有異。所有這些複雜元素的揉雜與重組，不論就理論面或歷史事實來說，都令蔣介石政權的威權主義性格，帶有非常駁雜的歷史因素傳承。

或許就因為這個原因，1980年代試圖開創相關研究的學者，包括若林正丈與鄭敦仁，要不是迷惑於不知該如何為之分類，要不就是抓住其中一項歷史因素，勉強稱之為帶有利寧式革命政黨特徵的威權主義。本文認為，不論是若林正丈所

<sup>86</sup> Amos Perlmutter在定義「現代威權主義」時，將歷史上的專制（autocracy）和暴政（tyranny）形容為「威權主義的早期版本」。參見Amos Perlmutter,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2. 本文固然借用Perlmutter對於威權主義的現代性的解釋，但並不想混淆威權主義與專制或暴政這些傳統型權力支配型態的界線。本文認為這樣的界限區分，才符合韋伯和胡安林茲有關「現代／傳統」的概念對比。

<sup>87</sup> Amos Perlmutter,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p. 2.

稱的「臺灣型威權主義」，或是鄭敦仁認定的「準列寧式威權主義」，都不足以清楚解釋兩蔣政權的威權統治特質。附加在兩蔣威權政體上的，除了因1923-1927年「國共合作」而染上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政黨特徵外，其實還有1930年代法西斯主義的若干特徵。另外因為蔣介石個人長期掌權，自1937年起蔣氏便在該黨特殊的黨國體制內培養其長子蔣經國接班，以致在1972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之後，蔣氏父子兩人超越了原本應該「以黨領國」的黨國模式，出現了準「家天下」的格局。以1950-1988年蔣氏家族持續壟斷國家權力的現實，如果1980年代蔣經國一意孤行要將國家權力交給蔣家第三代，難道完全沒有機會？沈之岳臨退休前推薦蔣孝武接下自己遺缺，表現的其實就是這種可能性，以及在當時環境下黨國官員爭相向蔣家表忠的集體心態。只是最終因為某些尚未釐清的主觀及客觀因素，臺灣政治並沒有走到那一步。<sup>88</sup>但這並不意味在蔣經國去世前的十年間，這樣的可能性不存在，或者是位高權重的黨國政要不這麼盤算。也就是說，從1950年代蔣介石處心積慮培養其長子接班起，到1985年8月蔣經國公開對外宣布蔣家族人不會繼任總統一職為止，中華民國的政府體制其實始終籠罩在某種家族政治的陰影之下。這一「路人皆知」的尷尬事實，有些類似「國王新衣」的寓言，無人敢於戳破，而將之寓意於「大力水手」漫畫中的柏楊，換來的則是超過十年的牢獄之災。

所以，兩蔣的威權統治，真的是一個純粹的「黨國」系統——不管這個「以黨領國」的模式係繼承自蘇聯共黨，或是法西斯德國？還是說，它擁有超越現今各種針對兩蔣政權所作理論論述所能界定以外的特徵，例如，被韋伯拿來當作「傳統支配型態」類型之一的「世襲制」（Patrimonialism）？韋伯對於「世襲制」的描述如下：

---

<sup>88</sup> 過去三十年來，學術界或政界確實不乏有人為蔣經國立傳，包括前文曾援引Jay Taylor（陶涵）的*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或者漆高儒的《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但尚未有人正面分析何以蔣經國遲至去世前兩年多的1985年8月16日，才在接受美國《時代》（*TIME*）雜誌香港分社主任仙杜拉·波頓（Sandra Burton）專訪時首度公開表態：「關於由蔣家人中的一員承繼總統一節，我從未有此考慮。」如果蔣經國真的「從未有此考慮」，那麼應該可以早一點把話說清楚。有關蔣經國接受仙杜拉·波頓專訪一事，參見王力行、汪士淳，《寧靜中的風雨——蔣孝勇的真實聲音》（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頁111。

當傳統支配型態發展出純粹作為個人工具且專屬於權力主宰者的行政體系和軍隊的時候，世襲制，以及其極致狀態的蘇丹制（sultanism），即應運而生。一開始，主宰者的權威仍看似明顯的為集體所有，但隨即變成他個人所有，他擅自挪用之，就如同他挪用任何他所擁有的普通物件一樣。原則上，他可以隨心所欲運用其特權，就像是任何經濟財一樣——出賣、典當，或因繼承而分割。<sup>89</sup>

蔣介石的國民黨在二十世紀歷史上因緣際會所繼承下來的政治元素，除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政黨組織、法西斯主義的領袖崇拜與秘密警察之外，還有傳統中國家族治理的「家天下」因子。<sup>90</sup> 蔣介石來到臺灣之後，終於發展出近似於「作為個人工具的行政體系和軍隊」，這一條件的形成，讓蔣介石有足夠的本錢，在一個以「黨國」為外在形貌的威權統治下，注入家族世襲的內涵。<sup>91</sup> 因此兩蔣政權在臺灣近代政治史上的意義，除了威權主義、以黨領政的黨國體系，及龐大的情治系統之外，其實還帶有強烈的「世襲」色彩。這一現象讓兩蔣時期的國民黨政權，不僅僅是一個擁有現代性的官僚化國家，同時還額外附帶了傳統支配型政權的特徵。

1953年因為政策理念不合而遠走美國的吳國楨其實看得最透澈，他在抵美第二年（1954）一口氣公開發表了五篇「上蔣介石書」，其中4月3日最後一篇如此批評蔣介石：

鈞座之病，則在自私。在大陸則祇顧個人之政權，在臺灣則於苟安之

<sup>89</sup>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231-232.

<sup>90</sup> 「家天下」是一個口語式的、對於傳統中國世襲制權力支配型態的俗稱。事實上，韋伯在《中國的宗教》一書中，對於中華帝國如何從更早的氏族封建制度演進到擁有官僚體系的世襲制，有相當嚴謹的區分及說明，本文無意混淆其間的知識意涵，特此說明。參見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4), pp. 33-62.

<sup>91</sup> 思想史學者林毓生對於蔣介石政權也有類似的評語，指出：「當時的統治集團是一個結合右派法西斯意識形態、左派列寧式政黨組織，揉雜著中國舊社會幫會性與家天下性格的政治勢力。」參見林毓生，〈敬悼民主運動先驅者傅正先生〉，收入宋英等著，《傅正先生紀念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1年），頁46。

後，又祇圖傳權於子；愛權甚於愛國，愛子甚於愛民。<sup>92</sup>

在全世界的威權主義政體中，由單一宰制型政黨壟斷國家權力的例子，並非少見，胡安林茲在其針對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的綜合研究中，便曾將史達林死後的蘇聯和諸多東歐共產集團國家，歸類為「後極權階段之威權政體」（post-totalitarian authoritarian regimes）。這類型的國家依然保有壟斷性的獨大政黨，但性質上已經脫離了極權主義範疇，來到威權型體制。<sup>93</sup> 至於1980年代之後由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亦有學者視之為威權政體。<sup>94</sup> 然而兩蔣政權除了一黨專政之外，卻又出現家天下的世襲特徵，這在全球威權主義光譜中，倒是罕見的案例，或許只有敘利亞的阿薩德家族（al-Assad family）差堪比擬。阿薩德家族第一代強人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在1970年發動政變取得政權之後，連任四屆總統，2000年病逝，之後由其二子巴夏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繼任總統，該家族已經統治敘利亞超過五十年。<sup>95</sup>

舉敘利亞為例，在於說明兩蔣政權的威權主義性質，其實遠比五十年來所有相關學術作品所陳述的，還要複雜得多。其原因與其說是兩蔣政權獨樹一幟，在全世界找不到近似的案例，還不如說是相關研究尚未臻周全。臺灣民主化三十年來，學術界對於該政權的真實面貌，所投入的氣力以及所完成的解釋模型，仍有所不足。本文用意，即在於透過柏楊案例，說明兩蔣政權所施行的獨裁統治，其實仍存在諸多幽微隱密處，值得繼續挖掘。

<sup>92</sup> 〈吳國楨上蔣介石書之五〉，收入吳國楨手稿，黃卓群口述，劉永昌整理，《吳國楨傳》，下冊（臺北：自由時報公司，1995年），頁563。

<sup>93</sup>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 *Macropolitical Theory*, pp. 336-350.

<sup>94</sup> 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自2003年起所發表的多篇論文，持續以「威權」概念分析中共政權。參見Andrew J.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1 (Jan. 2003), pp. 6-17.

<sup>95</sup> 全球另一非君主制政體（Monarchy）卻表現出強烈世襲特徵的國家，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的金氏政權。不過本文傾向認為，北韓勞動黨在政治體制和統治模式上，應歸類為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而非威權主義類型。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 《國防部》（臺北，國防部藏）  
〈憲兵警衛勤務案〉。  
《國家安全局》（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柳文卿案〉。  
〈崔小萍案〉。  
〈郭衣洞案〉。

### 二、日記、文集、回憶錄

- 干國勳等著，《藍衣社 復興社 力行社》。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編，《總裁關於黨的改造之訓示》。臺北：中央改造委員會文物供應社，1951年。  
沈醉、康澤等著，《親歷者講述軍統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  
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年。  
秦孝儀主編，《蔣總統集》，第1、2冊。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74年第4版。  
郝柏村，《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年》。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  
陶蔚然、胡性階等著，《親歷者講述中統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

### 三、公報、報紙

- 《中央日報》，臺北，1967年。  
《中華日報》，臺北，1968年。  
《總統府公報》，臺北，1967年。



#### 四、專書

- 丁仁方，《威權統合主義：理論、發展、與轉型》。臺北：時英出版社，1999年。
- 王力行、汪士淳，《寧靜中的風雨——蔣孝勇的真實聲音》。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
- 田弘茂，《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遷》。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 吳文程，《臺灣的民主轉型：從權威型的黨國體系到競爭性的政黨體系》。臺北：時英出版社，1996年。
- 吳國楨手稿，黃卓群口述，劉永昌整理，《吳國楨傳》。臺北：自由時報公司，1995年。
- 汪士淳，《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
- 松田康博，《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6年。
- 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
-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新自然主義公司，1994年。
- 孫家麒，《蔣經國建立台灣特務系統秘辛》。臺北：全能出版社，1988年（翻印自孫家麒著《蔣經國竊國內幕》1961年香港自力出版社版本）。
- 孫觀漢編著，《柏楊的冤獄》。高雄：敦理出版社，1988年。
- 國史館徵校處時政科編，《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錄——自行憲至民國六十七年五月》。臺北：國史館，1988年。
-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臺北：月旦出版公司，1995年。
- 彭懷恩，《臺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0年。
- 馮啟宏，《法西斯主義與三〇年代中國政治》。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8年。
- 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
- 漆高儒，《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北：正中書局，1998年。
- 趙昌平、林時機調查，監察院國防及情報委員會編，《郭衣洞叛亂案調查報告》。臺北：監察院，2004年。

-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9年。
- 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臺北：稻鄉出版社，2014年。
-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臺北：稻鄉出版社，1998年。
- Arendt, Hanna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Cleveland, Ohio: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8.
- Friedrich, Carl J.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 Habermas, Jürge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87.
- Kirby, William C.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Payne, Stanley G. *The Franco Regime 1936-1975*. London: Phoenix Press, 1987.
- Perlmutter, Amos.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Rigger, Shelley. *Politics in Taiwan: Voting for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1999.
- Taylor, Jay (陶涵).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Weber, Max.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4.
-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五、期刊論文、專書論文、學位論文

- 王振寰，〈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卷第1期（1989年3月）。
- 朱雲漢，〈寡佔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收入財團法人臺灣研究基金會編著，《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臺北：財團法人臺灣研究基金會，1989年。
- 李福鐘，〈兩蔣威權主義之類型分析〉，收入張炎憲、許文堂主編，《台灣地位與中華民國體制》。臺北：台灣教授協會，2012年。

- 李福鐘，〈兩蔣威權統治的地方基礎——兼論「以政養黨」與選舉舞弊〉，收入吳淑鳳等編，《臺灣歷史上的選舉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20年。
- 林佳龍，〈威權侍從政體下的台灣反對運動——民進黨社會基礎的政治解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卷第1期（1989年3月）。
- 林佳龍，〈解釋臺灣的民主化——政體類型與菁英的策略選擇〉，收入林佳龍、邱澤奇主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臺北：月旦出版社，1999年。
- 林毓生，〈敬悼民主運動先驅者傅正先生〉，收入宋英等著，《傅正先生紀念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1年。
- 若林正丈，〈岐路に立つ政治体制——権威主義体制の原型、變容、移行〉，收入若林正丈編著，《台灣——轉換期の政治と經濟》。東京：田畑書店，1987年。
- 徐振國，〈我國威權政體的發展及經濟制的演變：其互動關係的初探〉，《政治學報》，第16期（1988年12月）。
- 陳翠蓮，〈台灣戒嚴時期的特務統治與白色恐怖氛圍〉，收入張炎憲、陳美蓉主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年。
- 趙席簋，〈胡適與蔣介石關係的探討〉，收入胡春惠、呂紹理主編，《2011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2年。
- 趙席簋，〈1950年代的蔣介石與顧維鈞〉，收入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4年。
- 劉熙明，〈蔣中正與蔣經國在戒嚴時期「不當審判」中的角色〉，《臺灣史研究》，第6卷第2期（1999年12月）。
- 蕭李居，〈國防會議的設置與法源初探（1952-1967）〉，收入黃翔瑜編，《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8年。
- 薛化元、楊秀菁，〈強人威權體制的建構與轉變（1949-1992）〉，收入人權理論與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處編，《人權理論與歷史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4年。
- 嚴婉玲、陳翠蓮，〈1960年代政治反對人士強制遣返政策初探——以柳文卿案為中心〉，收於黃翔瑜編，《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8年。

- Cheng, Tun-jen (鄭敦仁).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1:4 (July 1989).
- Eastman, Lloyd E.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 1927-1937,” in Lloyd E. Eastman, Jerome Ch’en, Suzanne Pepper, Lyman P. van Slyke eds.,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Linz, Juan J.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pain,” in Erik Allardt and Stein Rokkan eds., *Mass Politics: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0.
- Linz, Juan J.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Macropolitical Theory*.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1975.
- Nathan, Andrew J.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1 (January 2003).
- Tai, Hungchao (戴鴻超). “The Kuomintang and Modernization in Taiwan,” in Samuel Huntington and Clement H. Moore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 Winckler, Edwin A.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99 (September 1984).
- Wu, Nai-the (吳乃德).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7.

## 六、網路資料

陳鈺馥報導，〈媒體噤聲年代！促轉會揭「大力水手」情治檔案〉，收入「《自由時報》網站」：<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278789>（2021/7/31點閱）。

